

张 冀 主 编

中产阶级与社会发展

MIDDLE CLA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 翼 主编

中产阶级与社会发展

MIDDLE CLA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产阶级与社会发展 / 张翼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203 - 1023 - 9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等资产阶级—研究—中国
IV. ①D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968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茵
特约编辑 马明 吕丞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7
字数 402 千字
定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中国社会的分化：中产化过程及中产阶层的崛起 …… 张 翼(1)

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

——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 李路路(13)

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

——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 …… 李友梅(34)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 周晓虹(58)

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 …… 刘 欣 朱 妍(78)

“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

分析 …… 李路路 李 升(105)

中产阶级“稳定器”理论质疑 …… 沈瑞英(128)

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他

——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

启示 …… 胡联合 胡鞍钢(137)

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

——中产阶层社会政治态度测量 …… 李春玲(162)

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 …… 张 翼(189)

政治学最高法则下的中产阶层“稳定器”构建战略

——兼与张翼先生商榷 …… 胡联合(219)

中间阶层的社會功能：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

框架 …… 李路路(243)

“自在”或“自为”：中产阶级与阶级意识 …… 沈瑞英(262)

当前中国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	齐杏发(277)
上海市新白领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	孙秀林 雷开春(292)
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	
——基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	金 桥(313)
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 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另一种	
模式	王建平(339)
中产阶级的经济生活与政治参与	
——以独立前的印度中产阶级为例	张春明(352)
中国中产阶层: 社会学异质性和政治不确定性	李 成(365)
中国城市社会阶级阶层冲突意识研究	张 翼(389)

导言 中国社会的分化：中产化过程及中产阶层的崛起

张翼*

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社会学学术研究的热切关注。

应该说，出版社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中国社会在新时代的核心问题：正如我们大家共同经历的那样，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过程中，社会的阶层结构也从相对比较简单状态转变为较为复杂的状态，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在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近距离流动中，一部分出身于农民阶层、工人阶层，以及其他新社会阶层的人们也适时转变为中产阶级。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在工业化完成劳动力的“工人化”之后，才开始劳动力的“中产化”过程，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下呈现的梯度发展结构，则将整个社会的“工人化”与“中产化”放在同一时代场景进行。所以，参与这一划时代巨变的中国社会，便一方面感触到了工人阶层的发展壮大，另外一方面也同时体会到了中产阶层的空前崛起。而新时代的阶层结构，还很可能在继续变动中使中产阶级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阶层。

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过程，在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中形塑了中产阶层的后备军。高歌猛进的工业化与后工业化、政府拉动、市场拉动抑或社会推进的城镇化、大城市化、特大城市化与超大城市化，则使中国中产阶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不仅在人数上迅速增

*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长，而且还通过新媒体网络的拓展以及在线的符号性交流而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虽然中产阶层仍然如米尔斯所说的那样被城市的高楼大厦、被一间又一间办公室分割为较小的物理空间存在，而不像工人阶层那样形成浩浩荡荡的聚集性产业大军。但新媒体所创造的网络交流，却将他们以虚拟社会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空间社会学在研究物理实体空间对人类交往行为之影响的同时，也发现了虚拟空间的实在性特征。中产阶层正是使用了虚拟社区的组织性与自组织能力，以时代所赋予的沟通渠道书写他们的阶层形成过程。

现在，中国的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已经形成既互相影响又互相区别的三大阶层。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要进行社会政策的配置，就不能不系统研究这三大阶层的政策需求。而作为阶层存在的这三大阶层，也日益表现出阶层意义的政策偏好诉求。事实上，只要存在阶层差别、存在阶层利益或阶层分化，社会政策的摇摆性便会体现出阶层利益的偏好性。同时，阶层利益的偏好性亦会影响社会政策的摇摆性。

正因为如此，研究中产阶层的社会存在及其阶层意识与社会态度，才应该成为新时代社会学研究责无旁贷的主题。但在历史长河里，对中国而言，中产阶层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有待深度认识的阶层。

这个阶层的社会来源、社会构成与社会态度，是一个需要在时代变化中被逐步讨论的问题。这个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关系、甚至于其对未来社会的预期等，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影响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后整个社会的消费诉求。

从大势上说，不管是工业化过程还是后工业化过程，都会使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人数规模不断壮大。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阶层的人数仍然会大幅降低，工人阶层——尤其是作为大国经济支撑力的工人阶层的数量终究会稳定在一个常量规模，这会给中产阶层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事实上，不无偏见地说，对中国未来意识形态形成重大影响，甚至于会引导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阶层，也可能是中产阶层。正因为这种重要性，我们才需要在梳理阶层变迁历史的过程中说明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态度的生成。

二

要在学理上分析和探视自 1949 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大流动状况，就必须将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制度配置结构结合起来。毕竟，作为微观意义个人流动之叙事事件的总和，有机构成了宏观意义社会流动的浩大场景。而制度变革，则正是将社会整体意义的宏观叙事划分为历史阶段的客观变量——其不仅将宏大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一个个截然不同的时期，而且将个人的命运也分割为跌宕起伏的篇章。当然，某些特殊群体会在不同历史变迁中获得更多收益，另外一些群体则在转折中失去原有地位，更多的群体则随历史的动荡而调适自己的生存机遇。在群体命运变化的背后——即在社会流动的结构原因背后，除个人自身的禀赋外，决定个人是否升迁的力量，主要取决于这些个体的家庭背景、社会交往资源、政治资源和教育资源等。而制度变革的巨大威力，则正是在调节这些变量的过程中，显现其影响芸芸众生命运的实在性。

中国的社会流动过程，可以主要被概括为 1949 到 1956 年的“初期阶层化”阶段、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一直到“文革”结束的“阶层化”阶段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再阶层化”阶段。

初期阶层化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对旧有流动秩序的改造和对新流动秩序的建立。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首先从农村打破了旧有社会的分层机制，继之又在城市形成了社会结构的主要调整动力，在对“剥削阶级”进行“革命”的基础上，充分提高了下层百姓的社会地位。通过划分土地使农民阶层焕发了生产积极性，通过制度性安排就业使工人阶层提升了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也使整个社会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中开创出了从精神到物质的欣欣向荣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与社会地位差距。

应该说，整体社会的“初期阶层化”过程并不等同于“去阶层化”过程。“去阶层化”指的是社会整体意义阶层差距的缩小和阶级阶层类别数量的减少，也指社会经济状况所导致的平均化过程。但 1949 之后的社会流动所表现出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是旧有社会上层阶层的向下流动和下层阶

层地位的向上流动^①。因为制度变革控制了某些阶层的发展空间，而给另外一些阶层的发展以有力支持，这才会打破原有的阶层化结构，一方面使阶级阶层之间缩小收入、声望和权力支配能力等方面的差距，另一方面则重新制造出新的分层标准——即在“经济剥削阶级”被颠覆之后，开始在新社会排列各个阶层的政治和经济的序列位置。所以，仔细分析和考察那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初期阶层化所导致的下层百姓的向上流动和曾经有产的阶层的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等，是制度变革形塑新流动秩序的过程。而正是在这一过程，那些社会地位趋于上升的阶层，才构成为“阶层化”时期新社会结构生成的基本模型。对于新型政权来说，除支持了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发展外，也铸造了一个为西方分层社会学家所标称的新阶层——干部阶层。

但社会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革命建造了一个新型的政权，但原有阶级阶层所形成的地位结构，则需要历史中被逐渐改造为符合新政权价值观的模式。故在“初期阶层化”时期，那些有产者的家庭——甚至于包括那些知识阶层的家庭，仍能像干部阶层的家庭一样，为自己子女提供较好的支持，使其进入大学获得较高的人力资本、使其在父亲的企业取得管理职位。仅从受教育机会来说，即使是在1956年9月，大多数大学生仍然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家庭：在高等学校本科在校学生中，只有34.2%的人出身于工农；在包括中科院系统在内的在读研究生中，也只有23.4%的人出身于工农。

在“初期阶层化”时期提升了社会地位的阶层，在随后的政权巩固中，继续加强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形成了为分层社会学家所说的“再分配经济”。这使具有再分配能力的“权力”获得了分层意义的支持。干部阶层的位置显著提升。从工资水平到实际福利等，干部及其家庭成员在再分配中具有较高获得优势。因此，在1957—1976这样漫长的二十年当中，社会流动的主要趋势都是：从农民向集体企

^① 有些社会史的研究发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或随后旧有上层阶层的向下流动，先表现在政治地位的下移，后表现为经济地位的下移——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化”——公有化或国有化后，经济地位就基本被消解了。但这个消解的过程是渐进的。有很多资料表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半叶，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家庭的子女，仍然在高等教育中占有较大比重。但在“文革”时期，“剥削阶级”家庭成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有了进一步的降低。

业工人再向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流动。获得了工人身份的人们，时刻渴望的“前途”就是将自己转化为干部。在集体经济工作的人员所渴望的目标，就是进入全民单位。级别较低全民单位人员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进入层级较高全民单位。“干部”这个身份及其获得途径，成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式的流动竞争。在制度安排中，“转户”与“转干”成为阶层提升的主要变量。甚至于到现在，国有企业与机关单位仍然是大学生梦寐以求的理想求职场所。正因为权力可以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支配力量，所以，中国社会的流动史，也随之进入到了明确的“阶层化”时期。

制度性历史事件的介入，极大地影响了“阶层化”时期某些人群的社会流动。比如说“反右”扩大化及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就冲击了知识分子的形象，使其社会地位较之以前有所降低，但作为一个阶层的力量，却并没有被完全消解——因为受到冲击的主要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自然科学知识分子，虽然也有沦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危险，但却被保留了工作岗位——不管是工资水平还是福利待遇，都具有比工农为高的获得优势。

在这一历史时期，那些在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或成分不好家庭的子女的社会流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家庭阶级出身也成为有效影响社会个体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变量。“文革”开始以后，阶级出身更是影响社会个体取得初始职业的门槛。虽然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使当时的城市就业人员逆城市化而反向流动，但那些家庭背景较好的子女，却可以依靠家庭的帮助而较早脱离“苦海”。即使在政治制度公平化取向的影响下，如果在“初职地位”获得中看不到家庭背景的作用，但在“终职地位”获得中，却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父母亲的影响力。尤其是干部阶层的子女，基本都会在随后的职业变动中，找到父母亲的“力量”。所以，对于人们获得的“现职职业地位”或“终职职业地位”来说，家庭对其子女具有不可估量的帮助。很多社会学的职业流动模型都很好证明了：干部子女在教育获得和职业获得上占有先机。

对“文革”时期的社会流动状况，也不能简单视之为“去阶层化”过程。由于户籍制度、转干制度、招工制度、入学制度、票证制度等的影响，中国社会的流动率很低，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特征。中国社会的各阶

层之间，也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流动壁垒。在农民、集体工人、全民工人和干部之间，很难发生规模较大的社会流动。虽然干部与工人阶层，在当时的社会，都享有“名义”的崇高地位，但从实际发生的制度性“收益”上考察，无疑地，干部阶层地位较为优越。

在这一时期，政治资本——“党员身份”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具有比较重要的支持作用。入了党的人比没有入党的人更易于受到组织的培养，更易于流动到较高的阶层。当然，在论及于此的时候，有些人会从政治符号的资本意义上进行诠释，认为“党员”本身就是“政治资本”。所以，先“入党”再被赋予“重任”是一种流动；而进入了容易“入党”的单位——比如机关事业单位，然后再获得“党员身份”则是另外一种“先流动职业地位”再获得“政治资本”的流动。需要指出的是：那些追求上进的“党员”们，其人力资本本身就可能高于常人。在这一意义上，党员身份对流动的促进作用，背后既体现组织关怀的作用，也反映个人特质的影响。

与以往人们的认识所不同的是，即使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人们的文化程度也对其是否可能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具有很强的支持作用。念书较多的人比念书较少的人更易于流动到社会的上层。正因为这样，某些身为“干部”的人，才在“推荐上大学”时期，为子女谋取到名额，使其进入文凭生产的重要机构，拿到进入社会上层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场券——教育资本。正因为如此，1972年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新时期以来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启动了经济腾飞的步伐，而且也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流动机制。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方式的杠杆性作用，率先在体制外滋生了与私有资产有关的流动渠道。社会流动的趋向与原动力，也开始随制度的变革而变化。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也被导入到“再阶层化”时期。人们在流动中追逐的资源，从单元的权力资本与福利资本，开始向多元的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包括福利资本）和声望资本等转移。因此，这一时期社会流动的渠道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向具有权力资源的党政部门及具有垄断能力的体制内企业流动；另外一方面，也开始将自己从传统职业向新型职业转化，而私有企业和各种形式的

外资企业等，则成为新型职业衍生的基地和试验场。

处于优势群体的许多家庭都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家庭成员分派在这两个不同的就业领域，形成所谓“一家两制”的安排，即充分享受后计划经济时代的优厚福利遗产，又竭力吸纳改革所带来的工资高额回报。毕竟，在后“单位制”时代，政府部门那只看得见的手仍然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场域以配置资源——即仍然对人们的社会流动具有无与伦比的支持力。

另外，在改革开放之初，拾遗补阙于国民经济边缘地带的私有经济的萌芽者——个体户，以及部分不能进入全民单位或城市集体单位就业的社会不良人员，也始料不及地成为时代的娇儿，将自己从社会的低层自发地往高层拉动。在制度创新中开始搞“越轨经济”的人物，也成为发家致富的急先锋。那些走街串巷的人们、曾经可能会被标签为“投机倒把”者，但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逻辑中，成功上升为具有宽泛内涵的“老板”。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教师和科研人员收入的提高，以生产和再生产文凭为特征的教育部门，成为社会流动的热点——这造成以教师为主要构成群体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实质性提高。知识分子一扫“臭老九”的标签，而智化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虽然曾经有人说“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作为一个阶层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一直高于卖茶叶蛋的。另外，农民阶层人口数量的相对减少、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的大规模转化（通过农民工的渠道）、工人阶层人口数量前所未有的增长、中产阶层的出现、有产阶级社会地位的重塑并提高等，是“再阶层化”时期社会流动的最大特色。

在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被摘除以后，家庭阶级成分对人们的社会流动不再具有特殊意义的影响。很多“出身不好”的家庭成员，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将自己流动到了比原来为高的社会位置。而父亲的社会地位，也开始对子女的社会流动产生了更强的支持作用。那些文化程度和职业地位都比较高的家长，将自己的阶层优势，通过合法渠道传承给了子女。在这一时期，在一般社会场域，“政治资本”的作用开始小于“教育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政治资本”在借助“教育资本”之后，才更显著发挥作用。伴随高中阶段教育和大学教育收费制度的实施，某些

贫困家庭的孩子开始失去竞争力。在大学扩招的潮流中，城镇和城市的孩子们得到了更多的机遇——这致使来自于农村的大学生在整个重点大学的生源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有所降低——这进一步影响未来社会精英的阶级出身构成。在某些特殊的社会场域，“政治资本”与“家庭出身”更好地支持了家庭成员的阶层地位获得，并通过阶级继承性封闭了某些重要的社会地位，使社会上层位置呈现出“先开放”又逐渐有所“闭合”的趋势。

应该说，市场化创造的流动机遇、工业化拉动的劳动力需求、城市化将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源源不断的转化、新经济创造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地位等，给全社会创造了整体意义的流动渠道与活力，这极大地刺激了新型职业和新型工作岗位的产生。这是新时期以来致使全社会成员共同向上流动的巨大结构性力量。社会结构性因素所创造的机会与新型职业等，为社会下层的向上流动提供了巨大的拉力；但社会流动过程中家庭背景的作用，则增加了社会流动的封闭性。某些高层官员的腐败、某些教育机构的文凭市场化、某些高高在上的有产阶层的越轨经营等，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公正原则，影响着社会下层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认同评价。因此，如何增加社会的福利，如何拓展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如何使社会上层人们的行为被社会大众所尊重，如何在教育改革中增加社会下层进入机会，如何在制度层面消除户籍的影响，是改革中期以后我们须认真思考的话题。

三

经济增速越快，社会转型速度就越快；经济增速放缓，社会转型的速度也会随之放缓。如果经济没有增速，则社会会表现出较强的结构化态势。但如果经济增速下降，某些阶层就会出现向下流动的现象。这个思路已经越来越被诸多的社会学研究所证明。

应该说，社会结构的最主要架构是阶层结构。在社会转型非常剧烈的时期——尤其是在各个阶层的成员不断变化位置，或者在各个阶层成员在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力量带动下普遍向上流动的时期，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难以表现为阶层性利益矛盾——毕竟，阶层形成与阶层团结、阶层行动之

间存在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耦合关系。但在社会结构化到一定程度，在社会流动难以为整个社会成员创造普遍化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时，社会矛盾就易于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矛盾。

这个判断得以成立的前提，则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学理性与实践性回答：阶层是一个“社会唯名”意义的符号人群，还是一个“社会唯实”意义的现实力量？因为对这一问题不同回答会产生不同的研究假设。近期，这一问题还与另外一个问题发生了相关——即使将阶层作为“社会唯实论”意义的人群组合，还需要论证阶层的自组织能力问题——甚至于还必须论证阶层同一性行动的可能性问题。社会个体的利益与得失，如何才能上升为阶层的利益与得失？作为日常生活的社会个体，如何才能发出相对一致的行动以显示阶层力量？

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派与韦伯主义学派之间互相借鉴其研究成果，互相吸收其对社会解释的合理内核，终于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从已经出版的中文和英文成果可以看出，在以韦伯主义构建的社会分层体系中，著述家也引进了阶级意识与阶级态度这样的名词；在以马克思主义构建的社会分层体系中，著述家也开始使用“社会流动”与“地位继承”这样的词语。这让人们从赖特与高索普的理论中看到了不同派别日益综合的趋势。

但与此同时，认为阶级消亡及与抗争的观点也日益激烈。认为阶级消亡——或者认为阶级干脆就不具有“原因”意义的解释力的思想在欧美学界曾经大行其道。在戴维·李和布莱恩·特纳主编的那本《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的书中，就详细介绍了社会学坦诚而激烈的争论。认为阶级消亡的观点说：后工业主义、民族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投票等研究视角，已经看不出阶级作为自变量的作用力。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选举，已经越来越不具有阶层意义。其所使用的例证是：工人阶层也会投保守党的票，资本家阶层也会投工党或社民党的票。

可认为阶层仍然是社会学核心概念的社会学者，则仍然坚强地站在其理论假设之上，认为阶层是社会学最主要和最核心的变量——这既可以作为因变量、也可以作为自变量被处理——尽管不同的社会学家使用不同的概念，但却都被冠以——“阶层”来表达。于是就返回到古老的学理冲突

中——阶层作为社会的主要结构——会被赋予某种特质的社会态度或阶层意识——产生了阶层意识的“阶层”——会生成阶层性集体行动。在国际学术界，每逢资本主义出现危机，认为阶层具有现实解释力的思潮就高昂；每逢资本主义顺利发展，认为阶层消亡的思潮就大行其道。在最近五年，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不管是特朗普的当选，还是英国的脱欧等，都显著表现出了阶层的影响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是在研究工人阶层从“自在”到“自为”过程中说明阶级意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在此之后的有些社会学家，有些承认无产阶级存在阶级意识，有些不承认无产阶级存在阶级意识。承认无产阶级存在阶级意识的作家，也有承认其他阶级也存在阶级意识的，也有不承认其他阶级存在阶级意识的。但在因循自己的研究，并持之以恒坚持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或新左派的社会学家中，赖特却将工人阶层的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放在同一互动过程中来研究，并认为在一种情况下，“工人的力量将削弱资本家单方做出各种决定的能力”，但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工人的力量将帮助资本家解决他们面临的多种多样的集体行动问题”。如果资本家作为阶层意义的集体行动会在工人阶层的“力量”压力下得以形成，则资本家的阶层意识或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就是可能的（相关内容可参见《工人阶层的力量、中产阶层的利益和阶级妥协》一文）。

如果赖特等人的论述我们能够接受，则可以将这样的推论向更多的阶级或阶层推演，即不仅工人阶层和资本阶层能够形成阶层意识，而且农民阶层、中产阶层等也能够形成阶层意识。这就是说，中产阶层作为一个阶层的社会态度或阶层意识的形成是可能的。

四

中国有关中产阶层的研究，大体是在这样的假设下进行的。

虽然有些人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有些人认为中产阶层不一定是社会的稳定器，但作为阶层的力量，如果中产阶层不被视为一盘散沙的无意识阶级，则作为稳定器或非稳定器的认识，就基于对中产阶层或

“白领阶层”的自觉的阶层行动或阶层态度而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结构的形成才具有基础作用。有了结构，结构本身发挥的功能才可预期。正因为这样，我在选择近期有关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的已发文章时，更加看重的是文章本身的质量与影响以及文章内容的代表性。

进入新时代之后，社会分层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不仅继承了传统的演化理路，而且还加入了一些新生的因素，比如户籍制度与房屋资产等。户籍曾经在分层体系中有所淡化，可最近一段时间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内容，无不加强了户籍的标签与资源配置功能。房产价格的迅速提升，将许多非户籍劳动力排除出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层体系，使之成为永远的流动人口。比如说大学毕业生，面对高额房价，如果按揭购房，则会终身为银行打工。如果按照当前的市场配置，其一年的工资积累只能购买一两个平方米，于是极有可能成为永久无房户。在将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居民分为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之后，那些沦为无房阶层的成员，很难逾越有无房产之间的鸿沟。在传统分层体系中，教育、收入、职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阶层地位。而决定职业地位和收入层次的变量，又主要依赖于一个人获得的教育程度。但在房产价格攀升的大格局中，无论教育程度如何，也无论你受雇于那种类型的企业获得工资，这些工资的积累都难以改变无房阶层的地位。在中国，居者有其房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如果一个劳动者穷其一生也无法以工资性收入买到一套房，则会动摇整个社会的流动机制以及人们对这些流动机制的伦理评价！这反过来会直接影响人们对当前社会的整体判断：老老实实的工作远不如那些炒房的人更易于积累资金与向上流动！即使某些投资于实体的雇主阶层，其每年的利润也赶不上炒房者出售一套房的收入。如果这个趋势难以改变，阶层的固化就不可避免。这也是学界普遍担心的问题。这里选择的文章，有些涉及这一内容，有些未曾涉及这个问题。但这些文章关注的主要焦点，都是社会流动及其结果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希望这些研究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认识社会变迁问题。

于是，在新发展阶段，各个阶层的社會态度就需要被关注和研究！本书收录的各位教授的大作，基本围绕这一主题而开展。虽然各位教授研究的焦点有所不同，但都在努力回答中国中产阶层的社會态度问题。从中产

阶层的来源、到中产阶层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中产阶层的崛起，再到对中产阶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态度的研究，表现着中国社会学人随时代发展而对中产阶层研究的进深推进。在这里，我真诚感谢各位作者的支持！

初始，按照出版社的要求，要将具有同样观点的文章结集在一起。但我考虑到中国的研究，不是非常明显的学派分野研究，而是基于不同数据与不同中产阶层定义个性化特征的研究。尽管这些文章讨论的问题相对比较集中，但基于调查所得到的结论——实际上是数据分析的模型结论以及数据分析的方法差异等形成的研究结论的差异。由此所产生的问题就是：变量的调整、调查数据代表性的变化、对中产阶层涵盖人群类别变化，会使各个文章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及其兴趣点发生变化——看起来是问题的争论，但背后却实际是变量之代表性的争论。这也是学界需要焦距问题的原因所在。总之，我感觉由概念本身涵盖的内容而引起的研究结论差异不应该作为学术争论的焦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尊重各位作者理论观点的呈现，而不是编辑过程的归类。

最后，我再次发自内心地感谢各位作者的支持。

相信读者会从不同作者的研究中吸收到自己所需要的养料。